



1944年，故宮駐峨嵋辦事處職員歡送當地駐軍王連長紀念照片（前排左一吳玉璋、左二那志良、左四王連長）



1939年，四川峨嵋辦事處之大門。



1939年，四川峨嵋辦事處之倉庫。

可是回憶本人在故宮服務的先後四年（一九六六—一九六八、一九七一）中，從沒有主動向他們請教過有關南遷種種，既顯示自己的無知，也後悔錯過大好時機！他們也從不誇耀自己的功績，可是歷史終究會給予他們應有的評價，他們（包括在故宮接觸較少的其他部門的前輩如吳玉璋、梁廷煒、譚旦岡、索子明、吳鳳培等等諸先生，甚至到四川峨嵋才入隊，在台時期任職

山博物館」和安谷鎮的「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中。在展覽圖版中莊嚴和那志良二先生是最常見的兩位。他們二位，莊先生是當時的副院長，那先生是筆者的直屬長官——書畫處處長。還有書畫處庫房的張德恆先生，在展覽的檔案圖片資料中則見到他以及莊夫人申若使用毛筆寫的簽名，都使我感到非常親切。而且他們毛筆字的書法水準，遠出於個人的預期；再加上此行一路追隨他們的足跡，更多地了解他們所遇的種種艱困，在人生疏的偏遠異鄉，一再遷徙，毫無怨言地一心為國寶尋找安全處所。

##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史上的奇蹟—— 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隨感

傅 申

在故宮文物運台六十年之後的二〇一〇年，兩岸故宮合作計畫中的一项：「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的活動，不但完全避開了當年文物運台的尷尬議題，而且一致地將第一代故宮人（包括中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軍侵華及掠奪中國文物的艱困狀況下，完全以國家文物為前提的種種英勇忠貞事蹟，認定這不僅僅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功臣，也是在世界文化史上的豐功偉績，甚至可以用「奇蹟」來看待！

### 前輩英雄

鄭欣淼院長強調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中，歐美各國多有保護搶救文物之舉，但以發起之早、規模之大、

歷時之久、搶救文物之多、過程之險，都無有過於故宮文物之南遷者。誠哉斯言！

在這樣的前提和共同認知之下，

當年被大陸電台譴責的來台故宮及中博前輩們，完全得到了平反！不如此，他們在南遷之路上都是名副其實的英雄，他們的史實和相片在「峨嵋





傅申於安谷鎮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提字：「濫故知新」，戴帽者為王聯春。



安谷鎮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大門口



朱潘劉三姓合祠現址為王聯春實業家之產業

那先生是公認的玉器專家，有專書之外，另有包羅凡書畫之外的各種器物，而有《古器物學概論》等等，所以那先生自認其專長為器物，並非書畫。但在台北故宮成立之初，卻被任命為書畫處長。這可能也是筆者和江

兆申在他手下擔任書畫處職員時，把任務派清後從不過問的原因吧。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卻有一本與研究書畫有密切關係的書就是《璽印通釋》，對書畫鑑藏史也有貢獻。至於莊嚴先生的學識和書法都

是人所共知的，這次訪問時，有其貴陽時舊識的後輩拿出珍藏的莊先生一九四二年的瘦金體詩稿，其時功力已是一流。而且從他的著述中得知，原來笨重又脆弱的石鼓在顛簸萬里之後，居然無損，是他在北京請教古董

書畫處庫房的牛仁堂等等）都是為保護國寶默默付出的英雄人物！

我在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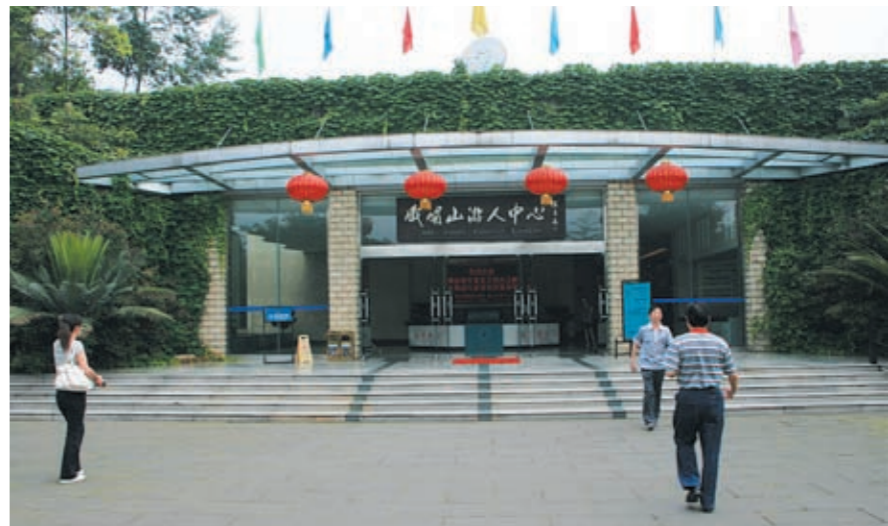
筆者在一九六五年秋與江兆申同

時被葉公超、陳雪屏兩位委員推薦入新落成的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書畫處服務，除了當時的院長蔣復璁先生之外，當時的副院長莊嚴先生以及各處的處長和研究員們，都是在抗戰期

間被日本空軍的轟炸機和陸軍的部隊先後尾隨進逼，三路人馬隨時負責尋覓安全及較大空間以臨時儲存一萬餘箱的國寶文物。直至八年抗戰勝利，又從大後方東運南京，最後因國共內戰在一九四九年又將部分的南遷精品文物運到台灣。（南遷文物三路合計一六六九九箱，運台二九二七箱）在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海峽的兩岸情勢極為緊張的年代裡，歷盡千辛萬苦負責押運文物來台的故宮前輩們仍然是惴惴不安的！在兩岸的砲火聲中，根據老故宮的前輩日後追述，在收音機裡偷聽大陸的廣播時，往往聽到大陸除了對老蔣總統之外，也對他們指名道姓地譴責他們搶運國寶來台，我想他們當時的心情是不好受的。可是，時間終究可以淘洗一切！



峨嵋山博物館入口



峨嵋山博物館入口

此外，有感於故宮前輩們，在顛沛流離中的物質及圖書都相對缺乏，卻仍然不斷研究，對學術做出了貢獻。例如那志良先生的著作《石鼓通考》一書，肇因於文物南遷時負責典守石鼓，在臨寫之餘不斷蒐集相關資料，寫成了一本綜合眾說的大著。



台北團成員於南京朝天宮庫房前留影，左起井迎瑞、莊靈、朱惠良、嵇若昕、劉芳如、鄭邦彥和張志光。

這段像傳奇一樣的史實永駐當地後人的心中，於是將他費時三年，耗資八百餘萬人民幣興建佔地五畝的「故

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趁著故宮博物院成立八十五週年，以及配合兩院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的機緣，剪綵開幕。館內的許多相關史料大多是請王德才先生收集整理，其中最顯眼的一件相關文物，是有國民政府大印的「功伴魯壁」大字刻匾，（是指當地保護國寶文物的功勞，等同於孔子舊宅壁中保存了被秦始皇所焚的古文經傳古籍一樣），尤其難得的是：這原是由國民政府分別頒發給當時存放故宮文物的：陳、趙、易、梁、和朱潘劉（三姓合祠）的各大祠堂，但遍覓沒有一塊完整存世的全匾，所以是由三塊殘匾拼湊而成的。該匾紀年「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是由當時的故宮院長馬衡親筆題寫，最難得的是扁額中央上方，鈐刻了一方國民政府的大印，在歷經破四舊和文化大革命中居然逃過一劫，如今復現人間，真是如同隔世！當然，最為感人的是像王聯春本人只因在孩提時的記憶激發了他的榮譽感，集合了當地的文史工作者，費神、費時、費錢、自動自發地在偏遠的鄉村做這樣一件他自認為

重要的事。不但昭告了他的鄉人、國人也昭告了日本人和世人！

最後，筆者要感謝台北故宮周功鑫院長及朱惠良領隊的邀請，能以故宮老館員以及北京故宮客座研究員的身分參與這次嚮往已久的「南遷之旅」，對北京故宮李文儒副院長的從容領隊風格，與他參訪各地時隨時訪察的親民作風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北京鄭欣森院長及李季副院長的親自參與前、中兩階段的參訪，提高了此行的檔次，也是鄭院長倡導「故宮學」的具體實踐！此行也有幸與前期參與的南京博物院龔良院長，以及全程參與的陸建芳所長相隨，增加了對「中央博物院」歷史的部份認識。

台北隊朱領隊的得體應對，莊靈兄的滿腹掌故，以及兩岸故宮全體隊員的親切交流，建立了新的友誼，都經井迎瑞教授師生自始至終毫不放鬆地作出了專業的音像紀錄。本人也深感有幸參與了這次成功而有歷史意義的「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的壯舉！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退休兼任教授



「功伴魯壁」匾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大印。

行家而想出的特殊包裝法的功勞！

最出吾人想像的，乃是南遷路上，還抽空編寫書畫目錄，不僅在文物存放的：南京、上海、貴陽、重慶和成都，先後展出百餘件精品，為當地人士津津樂道，而且還影響了不少



由三塊殘匾拼湊而成的「功伴魯壁」匾額



「功伴魯壁」複製匾，如今是安谷鎮「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的匾額。

書畫愛好者走上書畫創作的道路。這些雖然只是少數當時地方上的精英份子，但是這粒種子一直遞傳到當今眾多年輕的文史工作者在持續發揚。即使對廣大懵懂的群眾，大家都對故宮的國寶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為他們的祖先曾親身參與保護過，他們的土地和村莊曾經是「戰時的故宮」，深深地感到「與有榮焉」！這也讓我想到，北宋末因新舊黨爭而遭貶謫流離的蘇東坡和黃庭堅等，但他們所到之處不但歷代皆以為榮，也無形中產生「文化傳播」的能效！這是古物南遷路上的意外收穫！而當時的「文化傳播」還不限於國內，而且還遠赴英國倫敦和蘇聯莫斯科等地，成為故宮文物在國外展覽宣揚中華文物的先驅。

「功伴魯壁」

樂山安谷鎮泊灘村的王聯春先生，生於一九三九年，也就在那一年故宮的國寶九千箱轉移到安谷鎮的祠堂和寺廟裡，為文物南遷的最大宗，他從小就耳聞種種故事，並以家鄉的父老曾參與國寶的保護為榮，也為了